

生态文明建设
与区域创新发展

战略研究

(第一辑)



成金华 邓宏兵 ◎主编
杨树旺 白永亮 李小帆 ◎副主编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DIZHI DAXUE CHUBANSHE

首届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生态文明建设与 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辑)

成金华 邓宏兵 主 编>>>
杨树旺 白永亮 李小帆 副主编>>>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DIZHI DAXUE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第1辑/成金华, 邓宏兵主编.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25-3697-0

I. ①生…

II. ①成…②邓…

III. ①生态环境建设-研究-中国②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X321.2②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9457 号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研究(第一辑)

成金华 邓宏兵 主 编

杨树旺 白永亮 李小帆 副主编

责任编辑: 阎 娟 李 晶

责任校对: 周 旭

出版发行: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 号)

邮政编码: 430074

电 话: (027)67883511

传真: 67883580

E-mail: cbb@cug.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http://www.cugp.cug.edu.cn>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 356 千字 印张: 14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武汉市籍缘印刷厂

ISBN 978-7-5625-3697-0

定价: 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的重大国策,生态文明关系到我国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生态文明是当代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力资本经济相互融通构成的整体性文明,生态文明研究是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区域发展中的重大生态文明问题必须加以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要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进行。

鉴于此,2014年10月17日,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第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决定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牵头组建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2015年6月21日,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召开,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以“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区域创新发展和区域发展中的重大生态文明问题”研究为宗旨,对我国区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将成为我国区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智库。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将搭建这一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同国内外专家学者一道,共同深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专业委员会挂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日常工作由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分析软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中心)负责。

本文集是从大会收到的论文中精选而成,论文从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创新发展的视角进行了充分论述和探讨,对政府机关、高校、研究机构的同仁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和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及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分析软科学 Research 基地的大力支持和经费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

2015 年 7 月 1 日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

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简介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缩写 RSAC)是由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等发起,经国家教育部和民政部批准登记,中国区域科学界第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协会于1991年10月正式成立,挂靠在北京大学。2014年10月17日,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第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牵头组建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2015年6月21日正式挂牌成立。

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挂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日常工作由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分析软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中心)负责。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为成金华教授,常务副主任为邓宏兵教授,秘书长为白永亮副教授。挂靠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2014年被批准为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分析软科学研究基地,基地(中心)主任为邓宏兵教授。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区域发展问题及区域发展中的生态文明问题为本专业委员会要研究和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欢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参加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网站:www.cugqy.com

专业委员会邮箱:ecrsac@126.com

目录

生境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正道	唐代兴(1)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启示	陈宏滨(12)
试论生态思维方式及其对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型	陈红兵(18)
生态文明的经济理论体系初探	李欣广(27)
生态文明建设的分区推进研究	杜黎明(32)
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余维祥(42)
生态文明视角下产业结构优化对策研究	刘 伦,尤 喆,冯 银(45)
在江苏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两个率先”	耿步健,曹 克(57)
藏族传统生态文明与我国藏区生态(法治)建设研究	吕志祥,吕佳蒙(63)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研究	徐世甫(70)
生态红线保护研究进展与展望	侯沁言,刘成武,徐 珊,林兴林,胡 珊(77)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综述	胡 珊,黄利民,徐 珊,林兴林,侯沁言(89)
绿色增长的理论实践与“绿色化”的路径选择	田文富(97)
中国城市化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综合分析	曹娟,张 毅,汪洋洋,李胜坤,刘志方(103)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吴传清,陈文艳(114)
深圳茅洲河宝安段的水环境承载力问题研究	刘贇璠,蔡 青(123)
制度创新视角下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王宏斌(132)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回顾与展望	吴传清,龚 晨(139)
空间知识溢出相关研究进展与展望	许 娟,何天祥(148)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苏南地区种稻大户的调查	朱 萌,齐振宏,罗丽娜,邬兰娅,唐素云,张董敏(163)

以质量为核心推进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	邓宏兵,陈虎群,李永盛(177)
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研究·····	邓宏兵,李小帆,姚婷婷,陈虎群,刘欢(182)
湖北省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国际经验借鉴·····	姚婷婷(189)
神农架—武当山国家公园建设研究·····	罗腾飞(198)
区域整体联动与国家公园建设——以大洪山、三峡国家公园建设为例·····	李小帆(206)

生境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正道

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摘 要: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上,农业文明将人从动物社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人,因而,为了生存而只能依赖自然;工业文明却将人从身体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现代智力人,并为更好地生存而开发技术、征服自然和掠夺地球资源,致使人在与自然的对立中终结自我而开辟新文明。生态文明即是生境文明,它要将人从欲望中解救出来,使之成为具有整体关联智慧的人。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方向,不是通过保护环境而发展技术、开发资源、创造财富,实现物质幸福论梦想,而是遵循限度生存原理,以重建生境为整体战略,以全面开发人的心商和情商为社会动力,恢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生生能力,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方式,实现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

关键词:生境主义;生境文明;环境的生生能力;限度生存;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以历史的眼光看,人类创造文明,始终行进于过程之中:文明在过程中诞生,在过程中展开,在过程中不断生成和鼎新,由此才产生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虽然已被大力倡导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面推进,但无论从实践论,还是从理论言,对它的探索仅仅才开始。因为时至今日,生态文明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明的奠基认知,却并不明朗,有必要在已有的认知基础上予以重新探讨。本文就是这一重新探讨的尝试。

1 理论·实践·理论:生态文明的最初历程

“生态文明”一词诞生于1990年。25年后的今天,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几乎家喻户晓。其首功当属理论界:理论界的先行者们翻译、评介、传播西方社会的环保运动、绿色组织,绿党政治,反核运动,反消费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未来社会学、生态学,环境哲学、绿色政治学、后现代主义等方面的思想智慧,用“生态文明”概念来提炼之,然后加以广泛研究,并努力使之成为一个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和体现国家愿景的政治学术语。检索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生态文明”一语为篇名的文献多达28000条,其书名冠有“生态文明”概念的著作不下百种。

观览“生态文明”研究,可分前后两个时段,它以2007年为界。比较论之,2007年以前的生态文明研究所借助的主要思想资源,是西方的环保运动、未来社会学、生态学、环境哲学、绿色政治学、后现代主义等,其研究主要围绕“生态文明”概念定义、性质定位、形态构成等方面,

作者简介:唐代兴(1956—),男,四川人,教授,主要研究生态理性哲学——生境伦理。

各种有关于生态文明的“蓝图”迭出,但达成普遍共识的“生态文明”理念和社会图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和清晰的呈现。2007年以后,生态文明研究所凭借的主要资源,是执政党的社会发展纲领和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政策,所以其研究开始转向政策性的实证研究。

2007年,“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写进《十七大报告》,该报告第四部分从“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它是生态文明建设为之实现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概括地讲,建设生态文明,必以“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为主题,以节约资源、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为基本战略,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改善环境质量为根本目标。然而,从2007年到2012年,按照这种思路来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其环境状况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加恶劣。面对这一日趋恶劣的环境状况,《十八大报告》第八部分专论“生态文明”,并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基本国策”确立下来。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已不单纯是保证“又快又好发展经济”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人民福祉”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问题。所以,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将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过程”中去,也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更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认知态度,改变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引导全社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由此,生态文明的问题变得复杂了起来。

首先,建设生态文明,为什么要从“加快制度建设”入手?

其次,建设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这两个问题一旦被突显出来,至少说明在国家发展决策层面上,已经充分认识到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制度体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在事实上存在着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对人性的放逐,即现行的制度体系是建立在人性放逐的基础上的;人性放逐又是以不尊重自然,不顺应自然法则、规律为前提的。概言之,生态文明问题,是由环境生态的日益死境化所导出;造成环境生态的日益死境化的强大社会推动力量,却是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成为推动环境死境化的社会动力,是因为在工业文明信念武装下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狂妄地以人的规律取代了自然的规律。马克思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人类文明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违背自然规律,必然放逐人性;放逐人性,最终导致征服和掠夺;征服和掠夺所带来的不仅是自然的死亡,最终是人类丧失存在的土壤和生存的根基。所以,“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所构建起来的现代文明必然要遭遇衰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能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阿尔温·托夫勒，1984）我们今天之所以遭遇来自于地下、地面和天空的三维立体污染，遭遇无休止的灰霾和酸雨，遭遇不断扩张的土地沙漠化和耕地退化，遭遇无序交替的高温与严寒，遭遇更为令人担忧的北涝南旱的南北气候逆转等方面的环境恶化，是因为对物质的追逐使我们彻底地放逐了人性，并在人性放逐的过程中傲慢地把自己置于敌对自然的状态。

唯有沿着这样的认知思路，我们才可以真实地理解“《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展思路，其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视野不断扩大，实践认知不断提升，实践要求不断升级，它体现出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性、紧迫性和时不我待性，也反衬出了理论对实践的滞后性；理论的价值在于从实践中起步而超越实践的困惑或阻碍，为更好地实践提供认知引导和行动指南。理论滞后实践的现象一旦出现，则必然影响实践的正确展开。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业已滞后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要迅速突围其自我滞后状况，获得引导更高水平的实践的功能，则必须正视和解决如下三个根本问题：

- （1）生态文明到底是何种性质的文明？
- （2）如何来确定生态文明的实践目标？
- （3）怎样来开辟生态文明的实践道路？

2 生境化：生态文明的自身定位

要明晰生态文明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明，首先需要理解“文明”这个概念。要讨论“文明”，总离不开“文化”。在日常运用中，这两个概念往往互用，但二者实际上存在着区别：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进步状态。人类学家泰勒指出，文化是包括了由“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所构成的复合体（泰勒，1992）。马林诺夫斯基则进一步认为，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文化这个复合体是由人的行为、社会结构、组织、政治制度和经济思想以及基于人、社会、自然三者而生成的理想和神话构成（庄锡昌等，1987）。钱穆先生则认为文化由人对物（即经济）、人对人（即政治）和心对心（即精神和心灵）三个维度的内容构成（钱穆，2004）。整合论之，文化不过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及其自我所凝结成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文化成果，凡是具有引导或激发人健康存在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功能的，就是文明。

从其展开的基本方向看，文明总是进化的。由此形成人类对自我文明进化阶梯的认知和观念，这种认知和观念包含了类型学说。从整体上讲，人类将文明进化分为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步阶梯，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生产方式、技术手段和资源类型。比如，农业文明是将人从动物社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人，由于其能力相当薄弱而处于依赖自然的生存状态中，所以，为了生存而发展的技术体系是手工化的，并只能开发土地、树木等地表性资源。与此不同，工业文明是将人从身体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现代智力人，为更好地生存，以其人定胜天的冲动发展标准化、流水线生产的机械化技术体系，全方位地开发地面、地下和空中（比如风力、太

太阳能)资源。

工业文明要雄心勃勃地把人打造成为世界的主人,但由于他打开了人心的潘多拉盒子,最后使自己沦为欲望的奴隶和物质、资源、财富、权力的囚徒。人不仅与自然对立,更与自己分离,与文明分道扬镳。这就造成了现代文明的终结,人、社会包括地球生命和自然滑向了死境化的陷阱,面对此而不得不重建文明,这就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要将人从欲望中解救出来,使之成为具有整体关联智慧(心商、情商、智商协调开发)的人。因而,生态文明的着力点不是为实现物质幸福论梦想而发展技术,开发资源、生产财富,而是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生态文明是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存在关系的文明: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关系,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要很好地理解此,需深入理解“生态”的概念。

在西方,“生态”(ecology)概念源于古希腊 οίκος,意指生物的“栖息地”或“人的居所”,故而有“家务及家庭生活中的日常活动与管理”的含义。1866年赫克尔提出“生态学”(ecology)概念,同样是沿其思路而展开,即地球上的有机物生存在地球这个大家庭里,既相互冲突更相互照顾。赫克尔之后的生态学运动,将自然世界看成是人的存在家园,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存运动,是既充满矛盾又相互照顾的生产活动。概括地讲,“生态”意指生物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既展现出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生成关系,也张扬着生物自身的本性及存在敞开的生存习性。但这仅是“生态”概念的功能语义,要理解它的本质语义,需从汉语词源学入手。在汉语中,“生态”概念中的“生”,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它意指生命;作为动词,它意指使其存活而谋求生路、创造生机。而“生态”之“态”,乃指生命存在及其敞开的应有位态、姿态。整合言之,“生态”乃指生命之存在敞开状态及其朝向,它表明生命存在敞开的位态是未完成的,是动态生成的,这是因为生命本身是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一种进程。在其本原意义上,处于动态生成进程中的生命,其存在敞开的位态必然符合生命的自身本性,也符合自然宇宙的本性,因为生命是按照自然法则、宇宙律令而诞生的。但由于生命是以个体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下、地球之上和万物之中的,并且宇宙、地球、万物构成任何个体生命存在敞开的的环境,因而生命存在敞开的位态虽然要遵循自身本性,更要受其环境的制约。环境的任何变化都将影响个体生命的存在敞开位态;反之,以个体为单位的生命也成为环境的构成因子,个体生命的变化,同样影响到环境的改变。由此,无论是个体的生命,还是整体的环境,其存在敞开的位态均可因其自身之外的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两种可能性朝向,即生机勃勃的存在敞开朝向或无生气的衰败朝向:前一种朝向即是生境,后一种朝向乃是死境。

生境或死境,在相对环境才有意义,它是环境在自变或它变进程中呈现出来的两种方向相反、性质不同的存在敞开朝向。环境总是相对个体(物种、个体)生命而论,它是指个体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平台、场所。所以,环境的主体是个体生命或个体物种,环境存在敞开的生境或死境朝向,不过是存在其中的个体生命或个体物种存在敞开呈现的生境或死境朝向。

个体生命或个体物种赖以生存的环境,既有其微观形态,比如这片湿地成为这群生物栖息的具体环境,这片供这群生物栖息的湿地所呈现出来的朝向——或生机勃勃或无生机衰败——构成了这群生物栖息地的具体生态状况,或生境化生态状况,或死境化生态状况。这群生物所栖居的这片湿地的生态状况,并不完全由这片湿地本身决定,它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这群生物所栖居的这片湿地也有赖以存在敞开的的环境,这就是将这片湿地和这群生物聚焦起来的那个由人、社会、自然等因素所整合形成的宏观环境,以及更大的由人、生命、地球、宇

宙所整合形成的宇观环境。因而,个体生命或个体物种存在敞开的生态朝向——无论是生境朝向或死境朝向——始终处于动态生成的进程中,并且这一动态生成的进程要同时接受来自不同方面的四大因素的博弈,即个体生命或个体物种的本性力量,个体生命或个体物种生存的微观环境因素、宏观环境因素和整合此三者所形成的宇观环境因素,即大气运动和气候变化。

简言之,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地球和宇宙)之间的动态生成变化所形成进程状态,就是其环境;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间动态生成变化进程所敞开的朝向,不是生境化的,就是死境化的。

生境化或死境化,都是对环境生态状况的性质描述:前者是对生机勃勃状态的环境生态的描述;后者是对衰败死寂的环境生态的描述。从世界存在演化的绝对意义上讲,环境生态的生境化朝向,是自然宇宙以及万物生命存在演化所需要的,因为它符合自然法则、宇宙律令和万物生命的本性;环境生态的死境化朝向,却是自然宇宙以及万物生命存在演化所本能逃避的,因为它违背了自然法则、宇宙律令和万物生命的本性。同样,人作为自然宇宙的一分子,同样因其本性的要求而本能地排斥死境朝向。所以,从人的存在之需角度来审视,人类赖以存在和更好地存在的环境生态的生境化朝向,就是文明;反之,他所赖以存在和更好地存在的环境生态的死境化朝向,恰恰是对文明的反动和消解。以此观之,所谓生态文明,其实质是生境文明。所谓生境文明,就是人赖以存在和生存的环境生态必然是生机勃勃和生生不息的。或者更准确地讲,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间的动态生成变化始终处于生境化的进程状态,就是生境文明。

3 生境主义:生态文明的正道蓝图

由于生境化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所以,生态文明的正道蓝图是生境主义。

“生境”(habitat)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意指生物(包括个体、种群或群落)得以生存的地域环境。专门探讨“生境”问题的生态学家 Dennis 指出,“生境(habitat)乃为植物提供生长条件的常规自然”空间,“是生命种群的家……在种群和物种的管理和保育工作中,生境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生境是种群和物种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物种能够生存和繁殖的环境条件范围”(Ilkka Hanski, 2006)。Dennis 认为,生境是生物因为其存在敞开本身而相互作用创造的:“为了形成、生存和演化,地球上的生命需要足够的环境条件、时间和空间。在任何一个地点,生命和空间不断地相互影响,并随时间推移建立起了愈加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创造了生境”,并且这种创造的根源却是生命存在的内在结构要求和生命敞开的功能需要:“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在众多体现生命过程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建立起了精巧的相互关系。除非得到控制,生境丧失可能会摧毁这个平衡。它可能对生命以及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后果”(Ilkka Hanski, 2006)。Dennis 指出,生境创造是生命为其存在和更好地敞开存在而为之的体现,但生命为其存在和更好地敞开其存在的生存运动本身,却为生境丧失提供了契机。这就是说,生境创造和生境丧失,都源于生命为其存在和为其更好地存在本身。生命为其存在和更好地敞开存在而导致生境丧失有两种情况:一是生命为其存在而导致生境丧失。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之因不是生命存在的质量,而是生命存在的数量,“对个体而言生境质量如何往往依赖于在同地点存在的其他个体的密度。高密度的同种个体将导致必需资源短缺,从而降低了生境质量”(Ilkka Hanski, 2006)。生境质量下降,这是环境死境化的内在原因。但造成生境质量下降,

不仅源于同地点存在的同种个体的高密度化,也源于异种个体在同地点生存的高密度化,而且异种个体同地点生存的高密度化,更容易导致环境的死境化。这种因个体生命聚集高密度化生存造成生境质量下降并从而引发环境死境化的根本解释因素,恰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理。二是生命因为更好地敞开其存在而导致生境质量下降和环境死境化。Dennis 特别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当今整个世界生境丧失的根本原因。“在地球上,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导致世界生境丧失的物种生命,只有人类——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自然生境的快速减少”(Ilkka Hanski,2006)。人类因其物质幸福论的梦想而过度介入自然界的活动,导致了湿地和荒野的消失、森林丧失和物种大量灭绝。尤其是生物的“全球灭绝率目前估计是‘背景值’的 100 到 1000,而且灭绝速率就如本书所描绘的那样仍在不断上升。萎缩的世界是造成物种大灭绝的罪魁祸首,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生境丧失与破碎化。生境丧失是指物种的世界(它们的生境总量)减少;生境破碎化是指残余生境呈碎片状零星分布,这些碎片之间非常隔离以至于不同生境碎片上的同种个体之间无法发生联系。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物种的世界萎缩成了孤立的、局域种群太小以至于注定要灭绝的超微型世界。人类种群不断扩张和富裕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资源利用导致了生境丧失和破碎化”(Ilkka Hanski,2006)。

概括地讲,生境既是生物对其存在环境的本性要求,也是支撑生物得以敞开存在的环境的本原状态。这种本性要求和本原状态,揭示了生物、生物世界、自然之间的本原关系,也揭示了人与生物、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本原关系。这种本原关系就是其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这种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内在规定却是其亲生命本性,即生物、生物世界、自然以及人与地球生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原本就是亲生命性的。这种本原关系和这种亲生命性取向才是环境生境化的原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环境,不过生命与他者、人与他者之间所天然形成的亲缘性关系,这种关系的原生朝向,是亲生命性。这是环境生境化的本质描述,也是环境生境化的内在规定。

以此来看环境的死境化,就是环境的“生境丧失”和“生境破碎化”,它的根源却是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间的本原性亲缘关系的破裂和亲生命本性的丧失。形成这种死境化状况的最终力量,却是具有强大掠夺能力和占有欲望的人类活动。

人类没有止境的物质幸福论梦想落实为人类对自然的征伐活动,人类征伐自然的活动在事实上超过了地球所能够承受的限度,它一点一点累积生成一种反自然、反生命、反人类的强暴力量,推动生境丧失,加速生境破碎化,最终不仅威胁到地球和地球生物的存在安全,更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安全。于是,人类开始了对地球、生物世界和环境的拯救之旅,这即是生态学革命、环保运动、绿色政治、女权主义兴起的最终根源。然而,生境丧失和生境破碎化,表面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地球环境、生物环境的死境化,但本质上却是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本原环境的死境化,更是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间的本原性的亲缘关系全方位破裂和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之内在亲生命本性的丧失。所以,人类对地球、生命世界、环境的拯救之旅的实质所指,却是对人类自己的拯救行动。这种以拯救人类自我存在为本质诉求,以拯救地球、生命世界和自然生境为表现形态的拯救运动,就是存在的生境化重建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只能是生境文明建设。建设生境文明,其根本任务就是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共互生境。所以,重建生境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正道。

4 恢复环境能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

环境生境化是环境的本原朝向,它符合生命本性、自然法则、宇宙律令,也符合人性要求;环境的死境化是环境的异化朝向,它违背生命本性、自然法则、宇宙律令,也违反人性要求,是人类在过度介入环境的行动进程中对自我人性的反动。

环境的两极朝向,都源于环境自身的亲生命本性和与他者共互的本原性亲缘关系的律动:环境生境化,意味着环境的亲生命本性常驻,更意味着环境与他者共互的本原性亲缘关系的自我保持;反之,环境死境化则意味着环境的亲生命本性的丧失,更意味着环境与他者共互的本原性亲缘关系的破裂。环境及其所敞开的两极朝向,恰恰揭示环境具有生生能力,即自组织、自生成、自繁殖的能力和与他者共生的能力(唐代兴,2014),形成环境生生能力的直接的内在原动力,是环境的亲生命本性和环境与他者共互的本原性亲缘关系;形成环境生生能力的最终的内在原动力,却是生命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本性,或者说是生命以其自身之力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求生的朝向。一粒瓜果壳,被随意地抛在地里,它以自然的方式接受天地灵气和雨露阳光的滋养,发芽、破土而出、生长、开花、结果、成熟、衰亡,这全过程均因为它无论是作为一个潜在的生命(种子),还是作为一个现实的生命形态,始终处于未完成、待完成状态和致力于不断完成的状态进程中,这一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状态所敞开的进程,就是它被孕育、生长、成熟、衰亡的生命过程。植物世界植物的生存是如此,生物世界生物的生存是这样,人类世界人的生存同样是如此,没有例外,也不可能有例外。

环境的生生能力,就是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由于自生能力,环境能够生;由于共生能力,环境能够生生不息。环境的生生能力,既源于环境本身,更源于构成环境的主体本身。环境始终是既由生命所创造,更由生命所构成。正因为环境由生命所创造,所以 Dennis 所讲的“生命创造生境”才获得了最终的依据,并且,由于环境由生命所创造并由生命构成,才使生命本身既是存在主体,同时也是存在的条件。生命作为存在主体,它构成了环境之目的:环境的生境化,大而言之是以生命为目的,具体地讲以人为目的;生命作为存在的条件,它构成了环境之手段:环境的生境化,大而言之是以生命为手段,具体地讲亦以人为手段。所以,环境与生命、环境与人、生命与人此三者之间是互为目的和手段:人既是环境的目的,也是环境的手段;相应地,生命既是环境的目的,也是环境的手段。更进一步讲,环境既是人和生命的手段,也是人和生命的目的。人、生命、环境之间的这种互为“目—手段”的存在观和生存观,恰恰揭示了人、地球生命、环境或者说人、生命、自然之间的存在本质的同一。正是这种存在本质的同一,才使人、地球生命、环境或者说人、地球生命、自然在最终意义上是统一的,在法则、律令、本性上是共通的。

以此来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不是经济发展,也不是环境保护,更不是生态保育,而是环境自身的生生能力的恢复。

当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概括为恢复环境能力时,必要明确“环境”概念所指涉的范围。其实,前面的整个论述已为我们展示了“环境”的指涉疆域:我们所讨论的“环境”,既不是生物学视域的,也不是环境哲学视域的,而是指世界存在论和宇宙生存论视域的。作为世界存在论和宇宙生存论视域的环境,是以生命为中心、为主体、为目的。在特殊的语境中,它是指以人为核心的生命中心环境论。作为世界存在论和宇宙生存论视域的环境,围绕“生命—

人”而展开自然与社会两个扇面,形成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前一种环境以生命为中心,后一种环境以人为中心。由于人首先是物种生命,然后才是人,并且最终还是物种生命,人由此贯通了自然与社会;同时,物种生命也因为人的视野的不断扩大、人的存在足迹的不断拓展而进入人的社会,物种生命也由此将社会 and 自然连成一个网络。由于这两个方面因素的互为推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交叉、相互贯通,并且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

环境有微观、宏观和宇观三个维度。微观环境是指个体化的生命或人得以存在敞开的具体条件。宏观环境是指生物存在敞开和人存在敞开的社会条件,前者是自然社会条件,后者是人类社会条件。宇观环境是指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相共生的环境,它由大气运动和气候变化为敞开方式。

对环境的如上描述,是为展示作为世界存在论和宇宙生存论视域的环境的整体图景。但为表述方便,我们将环境概括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前者由生物环境、地球环境、宇宙环境所构成;后者既可由人际环境、族际环境、国际环境构成,也可进行领域性分类,而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教育环境、文化环境、道德环境等。

当我们概述了环境的构成及其类型,再回过头看环境的生生能力,它意指凡是环境,在本原意义上都有其生生能力,微观环境有其微观层面的生生能力,宏观环境有其宏观层面的生生能力,宇观环境有其宇观层面的生生能力。比如,一个生活小区或者校园,都是一个相对自洽的微观环境。在这个校园或生活小区里,房屋、小路、花园、通道、树木、花草、鸟虫,当然还包括生活或穿梭于这个小区或校园中的人以及各种微生物,它们之间在没有强暴的外力的破坏性打扰的情况下,始终处于自生与共生状态。再比如,气候变化,就是人和生命存在的宇观环境,但气候变化同样遵循自身的周期性时空韵律而自生和共生。气候变化的自生,就是大气环流、风调雨顺;气候变化的共生,就是它与宇宙和地球的轨道性运行、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的变化及其生物活动、人类行为等因素互为手段、目的。

以恢复环境能力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实际上是既指恢复自然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更指恢复社会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因为,由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推动所形成的工业文明真正衰败与终结的,不是其物质,也不是文化,更不是存在其中的自然环境,虽然自然环境——即生物环境、地球环境甚至宇宙环境——均因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纵深化而使其生境被迫丧失和破碎化,但这只是表象。因为自然环境的生境丧失和生境破碎化,最终是由人类无限度地界入自然世界的征伐活动所导致。进一步看,人类无限度地界入自然界的征伐活动,也仅仅是行为表现,它的本质却是人类在制度、政治、权利、知识、认知、思想、观念、方法、技术、文化精神、文明灵魂等所有领域都远离了人性,都违背了生命原理、自然法则、宇宙律令,这是人性沦丧、人心失律在制度、政治、权利、认知、知识、思想、观念、方法、技术、文化精神、文明灵魂等方面的表现,也是人性沦丧、人心失律在人类无限度地界入自然界展开掠夺性征服、改造的活动上的表现。所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所推动的工业文明的衰败与终结,最终是人心沉沦和人性终结,是其思想认知基础的坍塌、文化精神支柱的朽化、文明灵魂的彻底堕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可能性与现实性,就是建立在工业文明人心沉沦、人性终结、思想认知基础坍塌、文化精神支柱朽化、文明灵魂彻底堕落的基础上的。由此铸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使命,是再造人性,重塑人心,重建人类文明的思想认知基础、文化精神支柱和净化人类文明的灵魂。这一伟大的使命,必须从恢复环境的自生与共生能力入手。

恢复自然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就是恢复一棵树、一株草、一块耕地、一片山坡的自生和

共生能力,就是恢复湿地、荒野、森林、草原、江河湖海的自生与共生能力。抽象地讲,恢复自然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就是恢复地球的自承载力和自净化能力。这两个层面的自然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要得以全面的恢复,不是环境保护所能做到的,也不是生态保育所能完成的,它必须以社会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的恢复为前提、为动力。因为在今天,满目疮痍的自然环境生态状况,全因为人为。唯有改变人为,才可能真正改变自然环境的死境化状况。改变人为的实质是必须改变社会环境,使社会环境——从具体的人际环境到国际环境,从制度化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到教育、文化、道德环境——都逐渐恢复其自生和共生能力。使社会环境恢复自生和共生能力,实际上是再造制度,恢复人心和健美人性的力量,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心灵土壤、文化精神、文明基石,为生境主义化的生态文明的全人类到来,储存社会资源。

以恢复社会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为前提、为动力,恢复自然环境的自生和共生能力的实质性努力就是构建环境资源代际储存的人类机制,恢复自然环境的资源代际储存能力(唐代兴,2014)。

概括地讲,建设生境主义的生态文明,其核心任务是恢复环境能力,其实质性努力是恢复社会环境能力和自然环境能力。前者的重点是再造制度,恢复人心和人性的力量,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心灵土壤、文化精神、文明基石;后者的基本战略是恢复地球的自承载力和自净化力,恢复自然环境的资源代际储存能力。

5 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路径

如前所述,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根本区别是:工业文明目的在于更好地生存,因而,物质幸福论梦想成为必需的动力,追求无限度的生产,发展新的技术体系,全面开发人的智力,这是不断地实现更高水平的物质幸福论梦想的三大主题。对这三大主题的简化表述,就是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为表征的工业文明的主题歌:可持续发展观是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因为它的思想的本质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是“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人立法”,其思想的灵魂是“人是唯一的目的”(康德);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工业文明的认知准则,因为它内在地蕴含着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的经济技术理性原则;可持续发展逻辑,是工业文明的市场原理,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克里斯托弗·司徒博(2008)在《环境与发展:一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中提出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人的发展目标是人作为尺度?或者是人遵守尺度?或者人掌握尺度?”答案是: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保持和强化“人作为尺度”特权,又希望“人掌握尺度”,更梦想“人遵守尺度”。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模式所倡导和追求的是一种“贪婪的求全主义”。这种贪婪的求全主义既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性,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命原理、自然法则和宇宙律令。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生命和人,所依据的是有限原理”。并且,“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生命和人时,所赐予给这个世界及其万物生命和人的最终的存在尺度和生存法则,仍然是有限原理和法则”。人、生命、自然之间的本原性关系和亲生命性,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间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都是遵循有限原理和法则的体现。并且,世界的有限原理和法则,以及由此而生成构建起来的“人、生命、自然”之间的本原性关系、亲生命性和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准则,都是